

羊城春秋

广州城市历史研究手记

潘安 郭惠华
许滢 孙永生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羊城春秋

广州城市历史研究手记

潘安 郭惠华 许滢 孙永生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城春秋 广州城市历史研究手记 / 潘安等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112-19858-0

I. ①羊… II. ①潘… III. ①城市史—研究—广州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2968号

《羊城春秋》是《商都往事》的姊妹篇,讲述了1949年后广州城市的发展历程:从商圈的兴衰、工业的布局、交通枢纽的变迁等独特视角,梳理广州城市规划及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的脉络;反思20世纪90年代广州高速发展、人口暴增,规划缺失的惨痛代价;回顾战略规划引领城市发展、重构广州城市空间新格局、实现广州城历史上第三次蜕变的进程……

本书用平实手记式的笔触,以探求历史与规划未来的情怀,力求客观,或抚掌欣慰,或痛心疾首,抛砖引玉,启迪世人对广州城市未来发展的理性思考。

责任编辑:唐旭 杨晓
责任校对:李欣慰 赵颖

羊城春秋 广州城市历史研究手记

潘安 郭惠华 许滢 孙永生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1¼ 字数:450千字

2017年2月第一版 201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98.00元

ISBN 978-7-112-19858-0

(2933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言

广州，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变的城市，开元于秦朝。

初，秦将屠睢率50万军民南下，不幸遇袭身亡。后，任嚣承军民统帅之职，继续南下。时，监察御史史禄成功开凿灵渠，中原补给可由湘江经灵渠直达西江，岭南与中原一体化架构初见雏形。

任嚣征服岭南后，有两处可作为岭南首府的选址。一处北部湾，是当时中国下南海，向西航行，可抵印度及阿拉伯世界的成熟港区；另一处在珠江口，是当时可直接通过水运到达中原，尚待开发的港区。最终，秦朝选择了珠江口，广州城市应运而生。

广州，一座偏于一隅的岭南府城。它的诞生与成长更多的是顺从于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较少受制于中原固有的城市模式。丰富的水资源哺育着广州，也制约着广州。广州自建城以来，一直围绕着江河水系，寻求着城水共生共存，也不断突破着城市发展的边界。

自秦至唐，广州水患不断。唐朝初期，广州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其规模远远小于唐长安城中的一个市场。当时广州城内的房屋是以茅棚和竹寮为主构成的。破败拥挤的城市环境和它承担的国家对外通商的使命是极不相称的。

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在民间推广使用秦砖汉瓦，具有近1000年历史的广州迎来了第一次城市蜕变。经历这次蜕变之后，广州才呈现出世俗世界普遍认为城市应该有的样子。广州之所以在唐朝能够具备城市的基本特征，是因为唐朝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南大门，代表中国海外贸易官方形象的船舶司和船舶使相继出现在广州。

就城市而言，历经唐、宋，广州传统城市的格局和规模基本定型。唐朝中期解决了永久性建筑的材料问题，为后来广州本土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城市风貌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宋朝解决了城市基本形态、规模与有效建设用地问题。直至明朝，古城墙基本稳定。但城市功能沿珠江继续向西拓展的态势还在继续，清朝末期，广州城市空间直逼荔湾湿地，沿珠江一线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高高低

低的建筑，直至1859年英法联合租用沙面，沿珠江向西发展的广州城市空间结构基本稳定。

沿江向西发展是广州传统城市建设的基本方向。

北京路是广州传统城市中轴线，历代城墙与北京路交界处的城门遗址正是广州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节点，城市的重要建筑、商肆也在这一带云集。

广州，一座辐射华南的国家中心城市。它于20世纪初，吸取了西方最先进的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构建了近代城市空间架构，开始了广州城市的第二次蜕变。

引起这次城市蜕变的核心要素是机动车时代的突然降临。民国政府采取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拆城墙，筑马路；卖庙产，筹路款。广州近代城市中轴线的起义路原本只是一片寻常的建成区，就是这个时期拆建出来的。

民国政府通过连拆带建，打造了广州近代城市中轴线。其北缘起自越秀山中山纪念碑，经中山纪念堂、政府大楼、中央公园、广州解放纪念碑、海珠广场、海珠桥，一直到河南的刘王殿。

我们需要认真地感谢民国广州政府，因为他们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广州城市规划。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广州城市规划界的理论水平和实践与世界步伐是一致的。因此，面对伟大的变革，他们采用了非常正确的方式进行应对。

民国时期，广州的城市规划已经明确了向东延伸和跨江发展为广州城市拓展的主要方向。并且，在整个20世纪，广州都是沿着这个规划思路在不断地实施、完善。

民国广州政府对城市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将工业区放置在河南。这一举措为广州城市未来60年的发展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完整空间。在河南发展工业是要付出代价的，其最为首要的代价是要改航运跨江方式为陆运跨江方式。为此，国民政府不惜血本，引进海外技术力量，修建跨越珠江水面的海珠大桥，沟通了老城区与海珠岛的联系。海珠大桥通车后，国民政府还试图架设一座跨江大桥，连接老城区与芳村的陆路交通。

同时，民国政府还有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就是将机场由城东迁移到城北，为广州北部商圈的形成提前埋下了伏笔。广州早期的实验机场是设置在城市东部的二沙岛和天河。后来民国政府将机场搬到旧城北部，与工业区隔着旧城相望，使得老城区道路打通具有了更加不凡的意义。工业区和机场同时避让天河区，为后来城市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个看上去不经意，实质上意义深远的决策，历久而愈见其英明。足以说明当时政府对城市发展方向研究得透彻，目光放得长远。

民国政府在广州东部地区留下了一连串城市新的增长点。如：东山权贵区、五山高校区、黄埔船务区。这三个区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曾经是广州城市发展的脊梁。现在再来看这三个布点，它们全都大胆地跳出当时的城区，尤其是黄埔船务区的选择，当初的规划者没有因技术与经济水平有限就简单地选择建设江河内

港，而是直接跨越式地直奔海港，到现在还意义深远。我们不得不钦佩20世纪初那些规划大师们的远见卓识，好像围棋开局时随意地投了几颗孤子，其实是广州历史上第一次战略性、全域性的规划布局。在他们的规划中，广州城市格局已经拉得足够开，以致我们后面50年间只是继续把他们的思想落到实处。

民国政府对广州的另一个贡献是提供了兼容并蓄的建筑创作基地。唐朝之后，岭南风韵的建筑日渐凸显，建筑个性和城市特征走向成熟。民国时期，政府再次主动引进中国官式建筑风格和西方传统建筑风格。两种风格在广州城区集结碰撞，既争奇斗艳又相互包容。

1949年到2000年的50年间，广州城市建设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可以概括为：健康发展、稳步前进；后20年可以概括为：活力迸发、顶峰发展、代价惨重。

解放后，广州需要建立应对时事的城市建设模式。这种模式的探索试验就是越秀山体育场的建设和华南土特产交流会举办。越秀山体育场是动员全体市民参与，在极短的时间内修建的体育场，这是全民义务投入城市建设方式和成果的一次检验。随后的华南土特产交流会则是创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模式。交流会筹建集时事需求、全民参与、经济振兴及建筑风格探索为一体，成功地创建了广州新时代的建设模式，同时也推出了广州地方风格的基本模式。

1955年的中苏友好大厦开幕，1956年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举办，1957年的首届广交会开展，确定了广州对外贸易桥头堡的地位。此后的30年，广州以外贸桥头堡的需求为主导，沿着广州既有的规划思路不断地建设，不断地开辟，不断地创造，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

1952年，中山大学入主康乐园，比较有效地改善了海珠岛的人员结构、社会地位和功能结构。1960年，连接主城和芳村的珠江大桥正式开通。这座自起步到通车历经24年的大桥，包含了太多的辛酸，浸透了太多对跨江发展的渴望和韧性。在珠江大桥建设前前后后的时间里，广州造纸厂、造船厂、修造厂、钢铁厂和重型机械厂相继建成。河南重工业基地的布局和骨架搭建基本完成。同时，广佛及12县区域规划同步完成，广州与周边城市的空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并得到官方的肯定。

在大规模建设河南工业区的同时，城市并没有放弃对东部地区的改造。解放后，广州在城市的东北部建设了邮电新村、建设新村，引导市民中优秀分子东移。后期又建设了华侨新村，引进了友谊商店，为城市东部再次注入国际色彩，增加了东部区域的活力。同时，中山一院、省医院、省体育场、烈士陵园等公共场所的质量和环境的提升，对城市重心形成了较强大的拉力。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广州城市北部受白云山脉的影响、珠江航道的牵引，以及菊湖遗迹的制约，一直处于半发展状态。白云机场的投入使用增加了城市北部的拉力，但真正改变北部城区定位和功能的是新火车站和新广交会。随着水运势力的衰减，陆路、铁路和空运日益强大的条件下，白云机场、火车站和广交会三者合力构成的流花北部商圈是历史的必然。

在广州沿着不同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众多别开生面的建筑，这些建筑综合形成的广派建筑风格逐渐浮出、呈现。广派是相对于京派和海派而言的，京派重在对中國官式建筑风格的传承，海派重在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移植，广派追求的是现代建筑风格的创造。从华南土特产交流会十大建筑的创造到北园酒家的面世，是现代建筑初期落户广州的阶段，也是广派风格形成的阶段。而泮溪酒家、双溪别墅、白云山庄、兰圃、广州宾馆、矿泉客舍等建筑特色的探索，属于现代建筑研究深化阶段，也是广派建筑成熟发展阶段。东方宾馆、白云宾馆、友谊剧院和广交会馆则是现代建筑风格在广州鼎盛的阶段，也是广派建筑风格的顶峰时期，曾对全国建筑界产生井喷式影响。

秉承重视规划的传统，广州曾在1954~1956年的三年时间里编制了8稿城市总体规划。密集的总体规划编制既表现出政府对规划的重视，也反映了政府对未来城市的迷茫。而后，在1961年、1972年和1976年，三次中国政治风暴转折期的时候，广州都会编制一轮城市总体规划。这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财富！它既折射了政府对城市建设和环境改善的渴望和期待，也反映了城市规划对政府的依附。1984年，广州市政府编制的第14轮城市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批准，这是广州第一部具有法定地位的规划。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广州市政府首先着眼的工作是建成区内的交通环境整治。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为了配合机场、火车站和广交会，广州市政府首先打通的是城市北部交通脉络，这里包括大北立交的建设和人民路的开通。而后，政府的重点则放到向东发展的交通节点上。广州大道、区庄立交、中山路立交、天河立交就是为了应对天河体育中心和火车东站同步运行，在这段时间里先后完成的。1987年，六运会成功举办之后，城市的重点再次转移到南北交通的纾解方面。人民路高架桥和东濠涌高架桥是广州的一个伟大创举，解决了城市南北交通的主要问题。广州大桥、人民桥、海印桥、江湾大桥加密了跨江路网的密度。客村立交、洛溪桥将南北通道延伸至番禺。东风路的快速化、解放南路的扩宽、康王路的建设都在试图让城区内的交通更加便捷。

交通的发展自然是城市需求的表现。在政府致力于城区交通改善期间，正值广州活力大规模迸发时期。经历“文革”多年压抑之后，广州活力迸发表现的形式是多样的。高第街、上下九和西湖路灯光夜市的沸腾是草根阶层参与市场，并为使之活力化的标志。友谊商店平民化是市井商贸发达的一个标志。南方大厦顾客爆棚，经营面积一扩再扩，说明市场的需求与供应逆差的存在。白天鹅宾馆对市民开放是娱乐消费市场平民化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时期标志太多了，这些扑面而来的众多标志将高低贵贱放到同一个市场平台上，代表着广州市场经济的成熟。表现城市活力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开发区的出现。五羊新城的建设代表着居住小区的完善，反映的是城市基本功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将广州经济大潮再次推向新的巅峰。

让广州在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一路凯歌、迅猛发展的途中产生纠结的是

城市曾经一度失去了目标。

六运会是较早产生这种纠结的案例。六运会主场馆选址在原天河机场区域。天河机场是石牌校区和广州城区的绿化隔离带。天河机场的停用和东山的崛起让这个隔离带岌岌可危。六运会给天河带来无限的发展空间，场馆仍按隔离带的方式进行设计和建设。因此，并没有延伸南北轴线空间。珠江新城规划和车站的选址彻底打碎了隔离带的美梦。由于规划思路前后的不一致，至今天河体育中心与珠江新城、车站的空间关系仍不顺畅。无论如何，我们在肯定城市核心区东移价值的同时，不能不对规划落后于建设表示遗憾和抱歉。

新轴线诸多不和谐之处，是城市高速发展，众人应对不及，必然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案例。二沙岛住宅开发准备将公共资源私有化是一个因规划缺失导致管理失控的案例。珠江彩虹的灯光污染是现代领导对现代城市表现形式判断失误的一个案例。飞龙世界，世界大观，航天奇观，番禺梦幻影城等是经营主体对市场认知不足的案例。荔湾广场是对文化价值估价不清，暴殄天物的一个案例。在机场，开发区，城市经济良性有序的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因为城市的大政方针的缺失，城市规划定位和发展方向的缺失，城市经济目标、空间目标和管理目标的缺失，导致管理的缺失和盲目发展，城市环境恶化达到了极致。

当广州挣扎于城市环境恶化的时候，金融风暴突然降临，城市经济备受打击，广州为此付出了诸多惨痛的代价。

痛定思痛，从环境整治入手，痛改前非。

1997年，广州启动109项形象工程，提出拆违建绿的口号。边整治城市环境，边寻找解决城市问题的办法。广州拆违建绿的109项形象工程得到了市民的阵阵喝彩。随后，广州加大了城市环境整治力度。如：将珠江南岸沿江30米范围内的商用地改为绿化用地，将车站对面的商业用地改为绿化用地，拆除珠江彩虹，拆除人民南路匝道，确定1470公顷果园保护区范围等。

广州，一座正走向国际区域中心的城市。21世纪元年，广州城市总体规划横空出世，全新重构了广州现代城市框架，拉开了城市格局，确定了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广州城迎来了第三次蜕变。

在解放后的50年里，广州的城市规模虽有扩展，但城市空间依然是承传着民国时期建构的模式，围绕着旧城区逐步向外蔓延。但民国的广州是按200万人口设想的，至20世纪末，广州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重构广州成为历史的必然。

广州战略规划跳出了民国政府确立的“云山珠水”的空间格局，跃升为“山、城、田、海”的大山大海格局，变民国政府的“跨江发展”为“跨江面海”发展，变广州“江河城市”为“滨海城市”。按2000万人口的规模，按国际交通枢纽中心的定位，按建设国际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通过有机疏散、开辟新区和拉开建设等措施，全新建构了现代城市格局。如果说，唐宋时期，奠定了广州传统城市的空间格局；民国时期，奠定了广州近代城市的空间格局；

那么就一定可以说，广州战略规划奠定了广州现代城市的空间格局。

按战略规划，广州重新规划打造了城市新中轴线，其北缘起自白云山南麓燕岭公园，沿广州东站、天河体育中心、花城广场、海心沙、广州塔、岭南广场、湿地公园，直至珠江后航道中的南海心沙岛，全线12公里。

广州战略规划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它明确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空间战略方针，明确了山城田海的空间格局，明确了三纵四横的生态廊道，明确了用地、交通和生态三大要素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主题。

广州战略规划曾经在全国引发震动，并在国际规划界产生深远影响，后来国内有200多个城市相继编制了自己城市的战略规划。

在战略规划的指引下，广州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环境改造与城市框架重建工作。历经十年的努力，终于取得再次的辉煌。

在这十年里，广州重构了城市行政管理架构：除撤番禺市、花都市，改番禺区、花都区外，另新增萝岗区提升开发区成果，强化东进战略；新增南沙区，江海通道重心南移，力推南拓战略；合并东山越秀，培育越秀（含东山）、天河、萝岗（含黄埔）三大经济强区，构建城市东进的经济轴；荔湾、芳村合并，统筹广佛联络，加快西联战略的进程。

在这十年里，广州重组了三大对外交通布点：新建武广客运站，迁改白云机场、开辟南沙港，通过对外交通枢纽的重建，拉开城市布局。同时将交通建设重点从改善建成区通行环境转变为主动引领城市的发展方向。如，新光快速路、南沙港快速路、猎德大桥、科韵路、新滘南路等，道路建设先于城市需求。自此，城市交通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在这十年里，广州以重点建设项目推动战略规划实施。如，新体育馆、奥林匹克中心、大剧院、会展中心、省博物馆、大学城、西塔、“小蛮腰”、图书馆、少年宫等等一系列“高大上”的城市项目加快了广州走出困境的步伐。

在这十年里，广州通过新项目的选址实现战略规划的蓝图。大学城选址如此，亚运城选址也是如此；城市交通枢纽选址如此，城市经济布局也是如此。

在这十年里，广州极力维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强化白云山、万亩果园的保护措施，控制海鸥岛等一批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历经十年的磨难，历经十年的奋斗，历经十年的努力，广州终于能够拿出一个像样的城市奉献给亚运。

亚运盛会不过几十天的光景。亚运之后，广州还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南沙自贸区也许是广州后亚运时代的新起点。

广州，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变的城市。纵横的水网、广袤的田园、浩瀚的大海、包容的城市，历经一次次蜕变，继续寻求着与资源环境共生共存的城市发展之路。

诚然，我们规划广州的人口规模可以达到1500万或2200万，并非指当下的城市建设目标，而是模拟人口达到这个规模的时候，广州的城市环境和生态

环境将会是什么样子。也许2000万是广州城市资源环境对人口容量的极限。这个人口规模可能在20年后，可能在50年后，可能在100年或200年后出现，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我们祈祷广州的人口永远不会超过这个规模。城市的发展必须要留有空间，城市的资源不能在我们一代人手中消耗殆尽。

或许，城市的边界就在这里！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空间格局的形成	001
第二章 西部商圈的复兴	027
第三章 城市东进的延续	046
第四章 跨江发展的努力	066
第五章 北部商圈的形成	085
第六章 广派建筑的定格	106
第七章 法定规划的出现	129
第八章 交通环境的改善	153
第九章 商贸都市的觉醒	174
第十章 城市重心的东移	193
第十一章 高速发展的代价	211
第十二章 新型城市的整治	230
第十三章 战略规划的提出	249
第十四章 现代城市的格局	269
第十五章 亚运盛会的余音	295
主要参考文献	324
后 记	328

第一章 空间格局的形成

秦朝，六国大统。始皇南拓北御，征服岭南大片土地，始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岭南三郡由南海郡尉统领，首府设在广州。

广州之所以能够担此大任，原因在于西江和北江交汇于广州。西江和北江是中原与岭南往来的主要通道。控制广州，就等于控制了中原进入岭南的门户。因此，只要岭南是中国的一部分，广州就是岭南首府的唯一的选择，没有第二。

即便是天生的首府命，广州历史上也曾被狠狠地贬损了一次。

话说秦汉交替之际，天下大乱，岭南王赵佗举旗独立，建南越国。为了南越国的生存，赵佗前后五代斡旋于秦汉两朝，最终还是没有逃掉覆灭的命运。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对南越国失去了耐心，一举摧毁了赵氏王朝，并在盛怒之下，将岭南首府从广州迁至梧州辖区内的广信。至此，广州沉寂了数百年。

应该说，汉武帝不是在冷落广州，而是在放弃岭南地区。汉朝起起落落近四百年的历史中，除了偶尔去北部湾出出海，搞点山海奇珍之外，几乎在岭南没有什么建树。一个没有什么建树的年代，一个没有什么建树的地区，首府自然也没有什么建树。汉朝的岭南首府广信没有作为的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时间跨度不足两千年的今天，我们居然找不到广信城市存在的痕迹。只能依靠考古学家左推理、右判断，才能了解广信的大体方位。

毫无疑问，汉武帝废黜广州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在那个慢生活的年代，这个错误决定经历三百余年的磨砺才得以纠正。公元217年，三国时期吴国交州刺史步骘审时度势，决然将岭南首府从广信返迁广州，以期利用西江和北江通道，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控制。此时，中国航海技术日新月异，海路交通已经完善。从吴楚地区走东江或海路到达岭南的第一站也必定是广州。换句话说，西江、北江、东江和沿海等四条由中原进入岭南地区的主要通廊最终均交会于广州。

步骘是伟大的，步骘的决定是英明的。步骘之后广州保持着岭南首府的地位，直至今日。

广州恢复岭南首府地位后500余年的时间里，在城市建设方面没有太多的成就。唯一能够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其对水系的治理。数百年的理水努力功不可没，为唐朝突然来临的海上贸易活动奠定了扎实基础。

俗话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广州虽因水而生，却也因水为患。

广州城市因江海而创建，因江海而取得岭南首府的桂冠。但是，波浪滔天的江水、潮汐潮涌的海面、频频爆发的山洪也无时无刻不在威胁广州城市。

广州与江海的关系是相互抗争、相互妥协、共生共存的关系。早期的广州城市形态变化往往都是伴随着水系的演绎，城市建设活动也往往与水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说，广州城市的历史是顺应水系的基本规律，并给予适时的人为干预的历史。

湖泊是城市与江海关系的媒介。通过湖泊可以缓解江海水患给城市带来的压力，通过湖泊可以紧密江海与城市的关联。早期广州城市就是利用湖泊的作用与功能，在如狼似虎的水网中生存下来的。

广州历史上曾有三个非常著名的湖泊：菊湖、兰湖和西湖。这三个湖泊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对广州的安全生存、生活补给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菊湖，是为了应对“江水秋咸”和“白云山洪”而修建的人工湖泊。

所谓“江水秋咸”，是指大潮期间江海交汇处的海水逆江而上，短时间内占领部分淡水空间，并会在淡水水域残留少量海水成分的一种自然现象。

这种自然现象最为直观、也最为壮观的表现是钱塘江大潮。它曾经引发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折腰。

在广州，南海水域的海水潮汐直接推动珠江水面的潮涌，大潮期间，海水涌入珠江引发的江水倒灌虽没有钱塘江那么壮观，但也时常发生。南海的潮汐会导致珠江水域中海水与江水会师的“咸淡交汇线”上上下下不断地漂移。秋季，是这个“咸淡交汇线”最为活跃的季节。这个季节，“咸淡交汇线”甚至会逆江而上，移至城市附近，致使携带着海水成分的珠江水直接渗入地下水。如遇大潮、台风、暴雨等恶劣自然现象助虐，携带海水的珠江水倒灌进广州城里也时有发生。故每逢秋季，广州城内井水咸涩在所难免。

所谓“白云山洪”，是指每年秋天暴雨时节，山洪无规律地涌入城中，城市安全隐患颇为严峻。“小雨成流，中雨成洪，大雨成灾”是山水穿越广州城区的客观描述。

最早想到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人是交州刺史陆胤。他在岭南平叛之余，带领广州军民挖湖修渠，意图通过人工水渠将白云山的蒲涧帘泉水和暴雨期间的洪流分左右两个支流治之。其中右支部分水体被引导至甘溪，排入珠江；左支部分则流入人工湖。

所谓甘溪，顾名思义，水质甘甜的溪流。甘溪的称谓表达了当年广州市民对其水质的敬仰，也反证了广州市民饱受咸涩井水煎熬的事实。至今，我们仍可听闻以蒲涧帘泉水为卖点的白云猪手之类的美食。甘溪经文溪，或称越溪，沿城市东侧流入珠江。

人工湖蓄水成功之时，恰值秋岁，野菊花洋洋洒洒开满人工湖的四周。故人工湖有“菊湖”之称。因菊湖水源大部分来自于被誉为广州第三泉的白云山蒲涧帘泉水，故菊湖形成之后，就有“蒲涧众溪汇湖洋”之说。随着菊湖规模逐渐成形，城市饮水问题也逐渐得到解决，山洪隐患降至最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唐宋时代是菊湖的鼎盛时期。唐代，白云山的甘溪和东溪均注入菊湖。那个时期的菊湖，东自今天的黄华路，西至中山纪念堂，南抵东风路，北枕越秀山，淼淼水波衬映着遍地菊花，景象十分壮观。菊湖是广州历史上最大的人工湖。宋代羊城八景中的“菊湖云影”，描述的就是这一绚丽景观。

南宋之后，气候干旱，雨水逐年渐少，东溪的水源日渐不足，广州距海日远，“江水秋咸”的问题日益淡化，菊湖蓄水饮用的功用逐渐减弱，蓄水量慢慢减少，排洪功能得以凸显。菊湖与清水濠通过沟渠贯通，并纳入六脉渠的体系^①，以助排涝，兼顾起交通运输的功能。菊湖由蓄水转为排洪之后，水面逐渐干枯。

如果说，菊湖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城市的饮用水和防止山洪对城市的冲击，那么就可以说，兰湖的出现则是为了建立接纳来自中原船舶的基地和防止因西江、北江河水泛滥造成对广州城市的伤害。

兰湖也称芝兰湖，鼎盛时期的湖水面积约2.6平方公里。

兰湖，临北江的低洼地积水形成，是从中原走水道进入广州的第一码头。兰湖及其周边形成的湿地是阻挡西江、北江河水泛滥时冲击广州的第一道防线。

这个广州与中原联络的重要交通枢纽与驷马涌相通，湖水面积东起双井街，西抵洗马桥，南达西山，北至桂花岗。

从西江或北江进入广州的船只都经驷马涌到兰湖边靠岸。因为象岗就在兰湖东侧，所以兰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理想的避风塘。

到了唐代，通商的频繁使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码头，当时的南海县衙也曾经较长时间设于此。这个湖泊由于天然的内秀和政商的发展，周边逐渐集聚了许多名胜佳景。明代“羊城八景”中有“象山樵歌”，说的就是这一带的景致。在古籍《楚庭稗珠录》有诗曰：“芝兰生深林，无人常自芳。君子处阶前，明德惟馨香。游鱼物置罗，好鸟名鸳鸯。微风动林岸，此心共回翔。”可以想见，当时的兰湖周边是怎样一幅和谐生动的写意长卷。

南汉时期，刘龚向西南通浚，疏通兰湖水道，其港口码头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西湖最初的功能和兰湖的功能比较相近。西湖曾经是广州接待来自水路客



图1-1 菊湖、兰湖与甘溪

①菊湖沿南北向凿通，把水引入清水濠和西湖（这两条由大学士发动开凿的渠涌，后来被称为“文溪”，也就是“六脉渠”中的左一脉、左二脉）

人的官方基地，也是阻挡珠江正面冲击广州城市的天然屏障。

西湖位于广州城市的正南方向。就地理位置而言，西湖位于番山和禺山之西，也位于南越王公署西南，故有西湖之称。事实上，由秦至宋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广州城市始终都是由东向西发展的，因此，西湖不是位于城市的西边，而是位于城市正南方向。

西湖的位置曾经是广州水系流入珠江的重要出水口。2000年4月在惠福路与西湖路发现的秦汉水闸遗址，再现了当年西湖景色的壮观，也解析了珠江水系与城市水系的攻防关系。

严格地说，西湖属于半官方的人工湖泊。由于处于城市与珠江交界线的中心位置，促使西湖染上了诸多行政色彩。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格局理念，正南门是代表一个城市的礼仪之门，凡属于政府要员、政府要客和其他尊贵的来访者，进出广州必然会以西湖为站点。因此，西湖成为官方的重要接待基地是必然的。

西湖也是人为干涉最多的湖泊。西湖水闸遗址显示其基本功能是调剂水系流动。当珠江水位飙升的时候，水闸下落，防止珠江水入城；当珠江水位下降

的时候，水闸提升，将城市余水排入珠江。闸起闸落之间，完成了城市水系与珠江水系的交换，为城市赢得了最大利益。

兰湖、菊湖和西湖中，西湖的寿命最短。其原因是广州城市规模扩展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围江造城。公元917年，刘龚据岭南称帝，定都广州。这一时期他平番山、禺山和坡山，填平部分西湖湿地，开辟为城市建设用地。西湖至此“堕落”为城内官方苑囿园林，失去了调剂水系的作用。

相传刘龚将甘溪的一部分水流经人工水渠汇入西湖，又曾聚集神士在湖中的一个洲上炼丹，制长生不老药，故西湖又被叫作药洲、仙湖。宋朝之后，西湖是城市饮用水源地之一。

随着南汉国的覆灭，广州城区不断南扩，西湖首当其冲遭受城市建设的碾压，现如今已不复存在。

西湖是古代广州三大湖中最为风光的人工湖。刘龚治理西湖、开辟

图1-2 药洲遗址——位于今越秀区教育路（摄于2015年）



药洲，经整理后的西湖除了蓄洪的功能外，更多的是为城市和宫廷提升了生活情趣。就园林建设而言，西湖是成功的。现在的人们可以从西湖路这个路名，通过“药洲遗址”的名牌和残存在南方剧院里的一方池塘中落叶泛起的点点涟漪去追忆它往日的风采，同时，也忘却了它曾经是广州特别重要的水利功能。

盛唐时期，菊湖、兰湖和西湖规模与功能均达到最佳状态。三湖是确保广州安全立足水网并能得到健康发展之本。

回首当年，我们依稀可以这样描绘广州城市与山水格局的关联：滚滚珠江由西北而来，途经广州急转向东，贴临城市南部边界呼啸而下，直奔大海。珠江在广州留下了两个半岛，三个水湾。即，城市南部的番禺半岛和坡山半岛，两个半岛穿插三个水湾湿地。番禺半岛东为海印湾，坡山半岛西为浮丘湾，两半岛之间是海珠湾。城市北倚郁郁苍苍的越秀山和白云山，涓涓流水顺势而下，途中分为两路，一路奔向海印湾，另一路进入菊湖，再注入西湖，终经海珠湾流入珠江。城市东部有兰湖与珠江相隔，是接待中原方向远道客船的基地，兰湖最终经浮丘湾再度与珠江汇合。

珠江潮汐叠涌，气候温暖，风光秀丽。城内水陆交融，河涌相承。城郊内港码头星罗棋布，水利便捷，水资源丰富。岭南水城的气质不言自明。

故有后人如此评价广州城市：“包山带海……五岭峙其北，大海环其江，众水汇手前，群峰拥其后”^①。

①（清代）陈梦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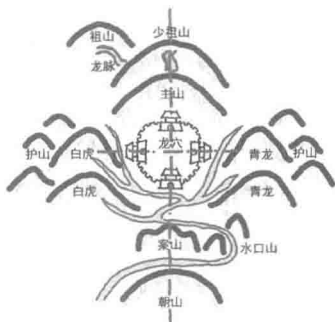


图1-3 早期广州与自然山水
(广州地理位置：南水北山、
最佳城池选址——包山带海)

书至唐朝，广州的水患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水系带给广州的不再是忧患，而是更多的利益。水系建构了城市对外交通网络，支撑着高效率低成本的海外商贸活动；水系曾经承载着部分城市交通功能；水系被誉为城市的血脉，为城市提供养分，为城市排除毒素；水系是城市防卫的天然屏障，攻防兼备，维系着广州的安全；水系防洪调蓄，为驻扎“云山珠水”之间的脆弱城市提供安全保障。水系为城市提供良好的自然景观和休憩场所。

唐朝是中国海上贸易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广州因水而兴的时代。

由于海上贸易需求量的喷发，广州一日之间转变为世界贸易大港。各色人

种纷至沓来，各类船只川流不息，各种交易络绎不绝。

繁忙的货物与繁忙的人群游走于水陆之间，广州积累千年的湖泊体系再次发挥出它的巨大潜力。湖泊的功能不仅仅是障水系统、排洪系统、调蓄系统，也不仅仅是防御系统、景观系统、生活娱乐系统，更重要的是它在水陆交通系统中起到了枢纽作用。

在广州展现出其极具海上贸易优势的外部环境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城市自身的弱点。

唐朝中期之前，广州城市遍布竹棚草寮。老百姓不懂如何烧制砖瓦，只能以茅草为盖，泥巴为墙，畏畏缩缩地生活在难以遮风避雨的简陋房屋中。城市形象着实令人汗颜。

①《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北宋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大唐盛世，长安城已经是举世闻名的国际都会，秦砖汉瓦早已是坊间百姓建筑的基本形式，被运用得滚瓜烂熟。而在广州城区，砖瓦建筑居然还仅仅是达官贵人以及官府衙门、庙宇道观的专属，的确有损于“岭南首府”、“海上贸易基地”的称号。痛定思痛，唐朝中期数任广东刺史励精图治教百姓烧砖制瓦，历经数十年，广州城区终于用砖瓦建筑取代了竹棚草寮。这个时期广州建筑风格基本是来自于距离岭南最近的苏宁风格。

有了唐朝的基础，到了宋朝，广州传统城市格局基本定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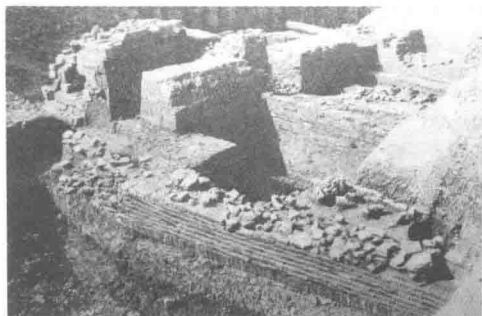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朝代。《清明上河图》^①记录的生活风俗是宋朝。

也许是曾经饱受军人之祸，宋朝自开国起就尚文轻武，“好铁不打钉，好

图1-4 唐朝砖瓦建筑开始普及



唐木构建筑遗址



宋砖筑城墙



宋修城砖戳印拓本